

论《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朱供罗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依经立义”即依托经典而建构意义,它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之中,是《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主要方式。汉代之前,圣人之言行与思想凝结在经典中,并以语言为载体发挥教化作用,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以及尊师敬老的思想共同组成“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经学正式确立后,“依经立义”也就成为人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方法,并衍生出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的方式。

关键词:依经立义;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尊师敬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5)05-0137-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22

On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 in *Wenxindiaolong*

ZHU Gong-luo

(Humanities College,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Mean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 found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psychology widely and deeply, is the main method fo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Wenxindiaolong*. Before Han dynasty, the behaviors and thoughts were collected in the classics and language played the function as enlightenment. The ideological base of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 is worships of saints, classics and language. Because of the five classics in the period of Hanwu Emperor, mean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 became the basic method to interpret classics and then the approache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were derived.

Key words: mean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s; saint worship; classic worship; language worship;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elders

“依经立义”有广、狭两种意义:狭义的“依经立义”指的是在经学系统中产生的,以儒家经典为阐发对象的意义生成与言说方式;广义的“依经立义”主要指以学界熟悉的典籍为依托,设立其先验合法性并由此生发自己观点的话语生产范式与意义生成方式。^[1]就《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而言,其主要构建方式是“依经立义”,并且是一种狭义的“依经立义”。因此,“依经立义”即依托儒家经典而建构意义。

明确提出“依经立义”一词的是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鹭,则时乘六龙;昆仑

流沙,则《禹贡》敷土。

这段话是对王逸《楚辞章句序》的概括。王逸《楚辞章句序》,推衍刘安《离骚传》的观点,反驳班固《离骚序》的评价,称屈原为“俊彦之英”,称《离骚》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赞扬;称颂屈原“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高尚品质,并尖锐斥责了班固标榜的明哲保身、苟合取安的处世原则;针对班固将《离骚》与《诗经》对立的作法,指出《离骚》接续了濒于断绝的《诗经》传统,充分肯定了《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2]王逸的论述方法是从《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典中寻求根据,以证实“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

收稿日期:2015-09-16

作者简介:朱供罗(1978—),男,湖南双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文学概论的教学与研究。

焉”^[3]。他认为,《诗经》的作者有所谓提起耳朵以示警戒之语,屈原则是委婉地加以讽谏(其讽谏态度甚至还没有《诗经》中的某些诗作那样激烈恳切)。《离骚》之作,依据经典而立论,如其中谈到的驾龙乘风便与《易经》中的“时乘六龙”相似;其中又谈到昆仑、流沙,其也与《尚书·禹贡》中谈到的大禹治理水土的内容一致。王逸评价屈原及其作品(包括《离骚》以外的其他作品)时,不是单独谈论屈原及其骚赋,而是立身于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背景并以儒家“五经”作为参照,认为离骚是符合五经创作原则(乃就委婉含蓄而言)与表现手法(乃就想象、夸张等手法而言)的。

刘勰将王逸“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的观点提炼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依经立义”虽为刘勰最早明确提出,但在刘勰之前,它就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之中。“依经立义”的前提是经典的确立,并且“依经立义”的经学阐释方式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比如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尊师敬老等。

一、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体现了人类的英雄崇拜情结,体现了人们对历史早期那些创立伟业、造福苍生的伟大人物的无限崇敬与爱戴。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

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天下之权衡也……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人为师。(《荀子·正名》)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象》)

《论语》《孟子》《荀子》《易传》的成书时间虽不能完全确定,但其成书于战国至汉初、在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前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书中所说的“圣人”“先王”是指儒家极力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人。“畏圣人之言”,“是非以圣人为

师”,“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明显地表现出古人的“圣人崇拜”思想。

“圣人崇拜”尤其与孔子密切相关。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是“六经”的重要整理者:“孔子之时,周室衰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踪三代之体,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4]1935-1936},“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1936},“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4]1936-1937},“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说卦》《文言》”^{[4]1937},这就是说“六经”都经孔圣亲手整理,有清楚的圣人胎记。

出于对圣人的崇拜,人们自然会对经圣人整理、有着圣人胎记的“六经”也存有崇拜之情,于是就发展成“经典崇拜”。

二、经典崇拜

经典首次确立是在汉武帝时期,但此前已有经典意识。“经”字取义,盖有二说,一是《说文解字》所说的“经,织从(纵)丝也”,二是刘熙载《释名·释典艺》所说的“经,径也,常典也”^{[5]27}这两种解说都表明“经”地位很重要,很有价值。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常用于培养贵族子弟,《礼记·王制》有言:“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6]孔子开设私学,教育学生,也应该“主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材”^{[5]28-29}。“孔子习《易》,修《春秋》之时,已是晚年。因此《易》与《春秋》成为儒者研习的科目,应当在孔子之后。”^{[5]29}结合司马迁《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1938}的说法来看,姜广辉之说有理。此处的“六艺”当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而没有提及《易》和《春秋》,因此《易》和《春秋》成为儒者研习科目可能是在孔子之后。如此则可以推论,在孔子之后,《诗》《书》《礼》《乐》《易》《春秋》(此亦称“六艺”者)成为儒者研习之书。

战国之时,学派林立,“各家学派标榜自家宗旨,称自家所习之文献为‘经’,以竟压别家文献”^{[5]29}。所以,各家各派都把本派所研习的文献称作“经”,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法经》等,而

儒家则将修习之“六艺”也看作“经”。“是‘经’名之立,应始于诸子纷纷著书立说之时。”^{[5]29}

除了自相标榜以竞压别家文献外,导致儒家称“六艺”为“经”的原因,可能还和“六艺”本身的传统性、规范性有关。正如姜广辉所指出的那样,“‘诗经’虽是后来的说法,但《诗》在缀以‘经’名之前已有了典的地位。这是由于在《诗》中有先祖的仪型,圣王的灵光,民族的历史,人生的启示和思想的积淀。”^{[5]448}同样,《尚书》被称作“经”之前也体现了“典”的意识。《尚书·说命下》说:“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7]175}此外,《毕命》也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7]245}这里的“古训”“大训”“先王成宪”都是指古圣先王的规范和训诫。

“典”的意识和“经”的立名,可看作是“经典崇拜”的体现。^①“经典崇拜”与“圣人崇拜”实质上是相通的,因为“经典”经过圣人整理,记载着圣人的言行,崇拜圣人自然崇拜经典。于是,两者也成为“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三、语言崇拜

圣人具有崇高的道德与伟大的人格,人们需要用语言来宣扬、歌颂。士大夫往来于诸侯国之间,需要拥有语言和文采才能不辱使命;普通人需要语言才能交流情感,表达志向,只有了解各种情况下不同的语言表现,才能准确地辨认说话者的精神、心理与思想等。所以,儒家很重视语言。在“五经”确立之前,儒家典籍中的有关材料表明人们已经有了语言崇拜的思想。因此,语言崇拜也成为“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诗经·大雅·抑》)

诗人认为,白玉的瑕疵还可以磨去,语言上的错误却是无法洗刷的。这里体现了一种“不能在语言上出现错误”的自觉意识。

将叛者,其辞慙,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周易·系辞下》)

“我知言。”

“何谓知言?”

曰:“诋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

《周易》微观地谈到了主体道德操守、精神状态与语言表现之间的关系,《孟子》则主张通过对语言的深入分析找出语言背后的错误,但“知言”还不是目的,要阻止这些错误的言辞在人们的心理产生,更不能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8]

《左传》此处引用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说明人们要通过有文采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其志向,孔子主张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表明语言须文采才能流传很远。这是对语言功能(言志)与效果(行远)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为众多能言善辩之士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文心雕龙·论说》),两位辩士用雄辩的口才保护了国家,留名青史;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凭借高超的游说技巧,获得财富和地位(《文心雕龙·论说》所谓“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体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的巨大影响。辩士横行,无疑会强化人们对语言的崇拜。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命题。通过立言,个体可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价值,就像建立崇高道德与伟烈丰功的人一样永垂不朽。无疑,这是古人语言崇拜的制高点。

“语言崇拜”也是和“圣人崇拜”“经典崇拜”紧密相连的。因为圣人之言行与思想凝结在经典的语言之中,经典以语言为载体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三者相互联结,共同成为“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①当然,此时学者虽然对经书格外尊重,然尚无后世那种超乎寻常的神圣化、神秘化的倾向。

四、尊师敬老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推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等教育方法,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在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应无异议。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魅力非凡的老师,自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和喜爱。

《论语》中随处可见“子曰”,这里的“子”都是指孔子,是对孔子的尊称。孔子首开私学,对学生只收一点微薄见面礼(“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所以他桃李满天下。孔子常常和学生杏坛下讨论,并相互启发,所以他在各方面都有杰出学生。学生们对孔子非常尊重,他们称孔子为“夫子”,并在孔子身旁尽心服侍,陪伴孔子周游列国。孔子死后,学生们都为他守孝三年,其中子贡因没能在最后时刻服侍孔子而为其守孝六年。孔子后学编撰《论语》,以记录孔子与其弟子们的言行,这是对孔子的尊崇,也为孔子思想学说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大儒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使孔子的儒家学说声望日隆。这其中,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除了有尊师的传统,还有敬老的传统。儒家历来重视孝道,对自家长辈的尊敬自然是应有之义。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9],主张由己及人,尊敬自家长辈及其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家小孩及其他人的小孩,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了,这也是敬老传统的体现。《礼记》则记载了人们敬老的许多情形,如: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飧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斋丧之事弗及也。(《礼记·内则》)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年纪越大,政府对老人越照顾越尊重,老人的地位也越高越优越。这是敬老的具体体现。

敬老与尊师相结合,构成了古人对于师长的尊敬,而对于师长的尊敬又让人们愿意遵循师长的教诲,愿意以师长的言行为榜样。这样的心理逐渐沉积,慢慢形成了古人对师长权威的顺从心理,而这也是“依经立义”产生的思想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尊师敬老与圣人崇拜虽都是对前人、对权威的尊崇,就孔子本人而言,他既是“圣人”又是“师长”,在他身上,体现了“圣人崇拜”与“尊师敬老”的统一。但“圣人崇拜”与“尊师敬老”的具体内涵并不一样:“圣人”是取得伟大功绩、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人,获得了社会群体内的广泛认同,“师长”则在影响力与认可度上有较大差距,但两者都留下可供后人效仿、遵从的教训或常规。这些教训或常规,也就是原始意义上的“经典”。

综上所述,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尊师敬老等思想逐渐累积传播,为“依经立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博士”,经学正式确立后,“依经立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方法,并由此衍生为一种话语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理论建构方式和学术研究方式,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由此,“依经立义”也就成为《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 [1]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J].中州学刊,2012(5):187-192.
- [2]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8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5946-5947.
- [3]王逸.楚辞章句序[M]//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0.
- [4]司马迁.史记·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7.
- [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42.
- [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8]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85.
- [9]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86.